

# 著名学者宋伟光： 做文献研究勘误学术史至关重要

治学者未免要引经据典，然而经典之中亦未免不存有讹误。张之洞谓：“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，一分瑕瑜而列朝去其十之八九矣。”对此，余嘉锡说：“而欲分真伪，则有三法，亦有三难。”他说的三法，一是考察史志及目录，以定其著者，以及其书是否曾经著录。二是考察本书，以验证其记载之合否。三是考察群书之所引用，以证今本是否为原书。然考其目录，则周秦之书也不一定皆为手著。《汉志》所载姓名不一定全属著述者。余嘉锡认为：“其他史志及目录所载书名撰人（《新唐书》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）皆不免有讹误。”而考其本书以验其记载是否合适，则会遇到古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问题：“或竹帛著自后师，或记叙成于众手，或编次于诸侯之客（见《史记·信陵君传》），或定著于写书之官（刘向）。”出处如此多端，必然会使逸事遗闻，残篇断简，并登诸油素，积成卷帙，导致：“故学案与语录同编，说解与经言并载。”更有甚者：“又笺注标识，混入正文，批答评论，咸从附录；以此语不类其生平，事并及于身后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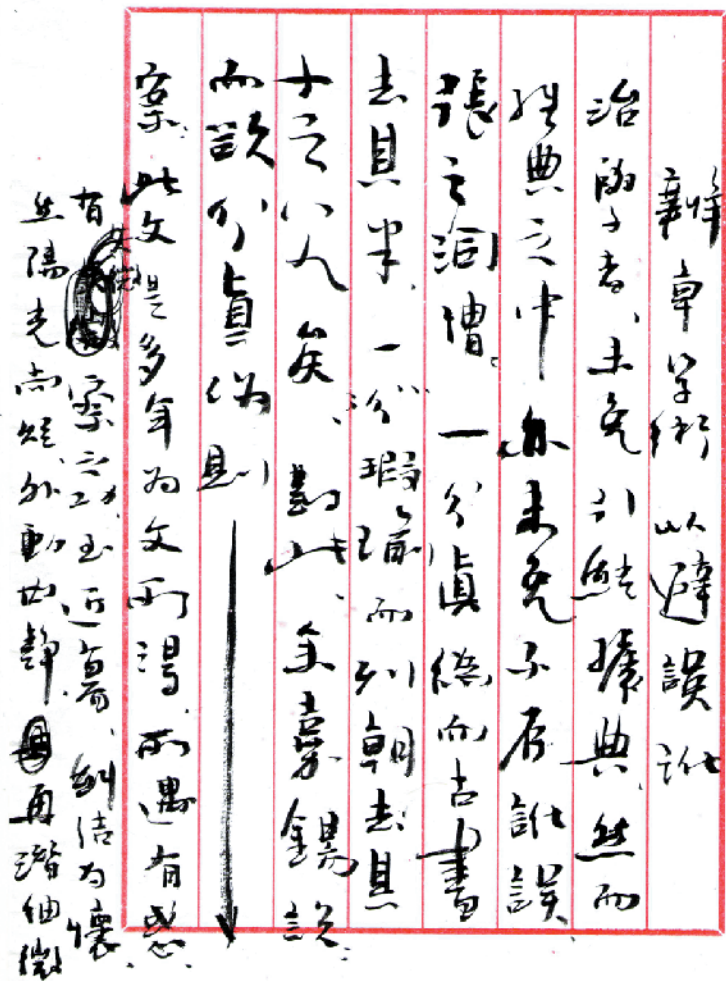
## 对于古书应知择别 打消凡古皆信心理

至于考群书之所引用，以证今本，也是问题多多。这是因为古书不免阙佚，加之传抄之时，畏其繁难，择况删并；校刻之际，用心不专，刊落不察。余嘉锡举《兔园册府》为例，说：“又有《兔园》之册，本出节钞，坏壁之余，原非完帙。而类书之采用，笺注之援引，往往著者则署为前人，书名则冠以‘又曰’；于是甲乙相淆，简篇互混。”余嘉锡的话具有警示意义，对于古书之阅读或引用，应知择别。要打消凡古皆信的心理。否则会以讹传讹，累叠之后，则成“又曰”。所以，考释版本，便成为辨章学术，以避误讹之必须。

做文献研究，对于重构古史，勘误学术史至关重要。余嘉锡之古书辨伪是对当时传世古书考订所发现的问题，他认为做学问要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入手，这是作为目录学家、古文献学家的治学经验。然而，随着简帛的出土，研究的领域，怀疑的范围在逐渐扩大，固有的学术定论遭到质疑甚至被推翻。如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发现的竹简《文子》便很能说明问题。对于今本《文子》自唐柳宗元始，至宋、元、明、清多将此指为伪书。认为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的不合。竹简本《文子》多记楚平王与文子之间问答，此与《汉志》所叙相吻合，以此似乎可以确证今本之伪。然而，经进一步比对，方知今本是将平王问文子，记为文子问老子，其余与竹简本相同。由此，可以认为今本《文子》尚有部分是原书。这种对于学术史的重新修正，是伴随考古学的进展而改变的，正如王国维所说：“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”。的确，中国的学术问题，自宋以来就有“辨伪之学”。19世纪末出现对于中国传统古史观的疑古思潮，古史辨派受到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白鸟库吉、法国汉学家亨利·马伯乐的影响。冯友兰则提出“信古、疑古、释古”的三段论。王国维提出“古史新证”。当下又有“古史重建”的提法。而西方对于文献的考辨有系统的“文献批评学”。这些对于古史的认识态度，是一种求真的科学精神。

## 学术研究往往停留在材料汇编上 致使对问题认识停留在表象层面

对于文献的考证，犹如“对考古学的考证”，须持怀疑和再认识的态度。考古学家力求用科学的方法再现过去，但像侦破案件一样，难免会出现误判。因为，我们所拥有的材料永远无法完全以已有的推找未知的。除了陆陆续续的考古新发现在不断地填补或矫正过去的认识，除此之外，就要依靠文字或文献了，但文



宋伟光手稿

献中的讹误，会起到误导的作用。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之真正原因，即便是对于史书记载，也需要怀疑。因为文字史料往往往胜利者的记载，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假性和主观性，往往又自相矛盾。考古学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不过是依据实物材料对照文献资料，努力做到一种有根据的猜测而已，以尽可能修正那种“文学性”的偏颇。因此，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就成为诠释古代问题的一种逻辑。

目前，学术界较固守于固有的学术范式，对此，李学勤指出：“我猜想，他们最忌讳的就是推倒重来，或者认定，任何历史只有‘续写’，没有‘改写’，即把学术史的发展仅仅看做史料的增加和细节考证的转密加详，而不是学术范式的改变。”学界有一种现象，习惯于以今天的观念来加给古人，以今人的思维来理解古代的现象。学术研究往往只停留在材料汇编上，这样将致使对问题的认识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层面。如研究美术史，不能仅从风格论上下结论或谈及一般的背景材料。举例说明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年代在美术史上定为“五代”，但沈从文从制度上深入考察，提出了新的怀疑他认为这幅画中所有男的都穿绿袍，从制度上来看，这可能是北宋初期所画比较合乎实际。另外，针对画中人物有双手交叉于胸前这个动作，他指出：“按照宋朝新立的

制度，凡是闲者诸人，即不做事的人，都要‘叉手示敬’。《事林广记》中提到，什么叫‘叉手示敬’呢？离开胸前三寸，凡是闲着的，晚一辈的，低一级的，没有事做的，都要用这个方式表示恭敬。”沈从文进一步指出：“这是宋朝的方式，一直到元朝还流行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和尚，也不忘这个规矩，更增加了这画是宋太祖至宋太宗时期产生的可能性大一些。”还有一点是，宴会所用酒具和注碗，都是典型的宋式。根据这些深层的考察，此画应该产生于北宋时期，某些方面像《簪花仕女图》一样可能是运用了前朝的粉本。

## 以“二重史证”开创 中国史学的新方法

考察学术史也不能仅依靠固有的文献来构架学术系统，往往是新材料的发现，补写甚至是改写了历史。如沈从文完稿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起初较缺乏上古材料，之后，随着80年代初的考古新发现，由王序补写了史前部分，也补入了战国时期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发现的服饰、丝绸材料。还有1978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唐代丝织品，有唐皇室供奉释迦牟尼佛骨舍利所用的丝织物，武则天供奉的盪金绣裙，织锦金袈裟等。这些发现证明

了沈从文早在20年之前所作出的：“唐代应有织锦物”的推断。

再如，以文献与实物结合讨论的学术经典王国维的《简牍简署考》在当时的年代所依靠的材料只有旧敦煌汉简经卷之类。之后，王国维提出的“二重史证”即以“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”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方法，但所运用的地下材料也仅仅有殷墟甲骨，商周金文以及敦煌经卷，流沙坠简等。尚无新发现的简帛和出土的古书，其研究方法虽是把考古引入历史研究，但其范围仍然属于以研究文字为中心的新金石学范畴，还非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。因此，学术史的进步不仅要依靠新的研究方法，也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和运用，两者相辅相成。

用已知的材料求证或重写学术，是不必局限于续写之层面的。重写往往是认识上的改变，不是于原本框架中的填补，它可能导致既有定论的瓦解，可能遭到攻击；它可能会有大的突破，也可能犯大的错误。这些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学术创新是需要勇气的。

（本文部分内容据李零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，余嘉锡《古书通例》，保罗·G·巴恩主编、郭小凌 王晓泰译《剑桥插图考古史》，李学勤《重写学术史》，王亚蓉编《沈从文晚年口述》等）

## 人物介绍



宋伟光

美术史论家、艺术批评家。《中国雕塑》执行主编、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。2016中国雕塑史论奖获得者。北京市规委咨询专家。清华美院课程导师。安徽师范大学教授、硕士。

